

画家尼科娜和她的情人们

空谷幽歌

奸之毒

后窗

さちーろりる de d an ha a

失踪者の電話



失踪者的电话

本社选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5.75印张 168 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500

ISBN 7—5354—0194—5

I·172 定价: 1.7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社编辑、出版的《世界通俗文学丛书》中的一种，所选作品均系世界各国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本书内有：

失踪者的电话 尼娜失踪半年之久仍无音讯，姐姐库拉金娜来到检察院刑侦处报案。

侦察长仔细倾听了库拉金娜的叙述，接着进行了大量调查，并将陈尸所内放着的半年前发现的一些无名尸块给库拉金娜进行确认，初步判定尼娜失踪为谋杀所至。

侦察长凭着他特有的感觉，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推理，疑点集中到尼娜的丈夫——民警局法医身上。在获取了大量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侦察长拘留了法医。可在当日半夜，侦察长却突然接到了失踪者打来的电话……

画家尼科娜和她的情人们 尼科娜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但她希冀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于是离开舒适的家来到了举世闻名的巴黎艺术区。然而由于生活的逼迫，她不得不一边当艺术模特儿委身于情人，一边作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具有艺术鉴赏力的阔佬杰罗姆，并爱上了他。杰罗姆答应帮她举办一次画展，但却是一个骗局。尼科娜处于绝望的最边缘，她不得不又去寻找以前的情人们。两年后，这位充满理想的女性，在艺术区留下的是一具惨遭不幸的尸体。

空谷幽歌 少女贝尔塔因不堪忍受父母虐待而逃进森林，在一个神秘的山谷中得了仙人的帮助，过着宁静的生活；但是，渴慕爱情与向往大世界的欲望驱使她背叛恩人，盗走珍宝……最后她和她的金发骑士都受到了惩罚。

奸之毒 生活严谨的仁科突然得了性病，他怀疑妻子的不忠。在他的追问下，妻子承认是与女儿的家庭教师风流过。不久，女儿考试落榜，家庭教师突然车祸身亡。接着女儿、妻子相继自杀……

原来女儿为了考上S高中，与该校掌管录取权的学习部长发生了性关系，并将她从家庭教师身上传染的病毒传给了他。不久，母亲为了女儿的事也来到了这位学习部长面前，为了复仇，这位学习部长将病毒传给了她的母亲。

世界通俗文学丛书

本社选编

失踪者的电话

目 录

失踪者的电话 [苏联]	阿·别祖格洛夫 著(1)
	张焕文 苏 攻 译

画家尼科娜和她的情人们 . [美国]	巴巴拉·约翰逊 著(43)
	李志兵 译

空谷幽歌 [德国]	路德维希·蒂克 著(56)
	林伟中 译

奸之毒 [日本]	森村诚一 著(63)
	贾春明 译

后窗 [美国]	威廉·艾里什 著(74)
	余 为 译

失踪者的电话

[苏联] 阿·别祖格洛夫 著
张焕文 苏 攻 译

1

这是2月中旬的一个平常日子。虽然还不到五点，莫斯科市检察院却已灯火通明，光照窗外。外面，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得正紧，雪片打在窗子上沙沙作响，大街上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车声。

检察院侦察长戈利斯特被叫到检察长的办公室里，市检察长把戈利斯特留了一个多小时。而当侦察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一位来访的妇女正在等他。

来访者年约30岁左右，身穿一件次毛料大衣，围一块灰色的绒毛头巾，满脸通红，不知是因为冻的，还是由于激动造成的，她请求检察机关的侦察员能接待她，听她申诉。

戈利斯特看看表，整6点。他心想，去幼儿园接儿子还来得及，因此就请这位妇女坐下。

她怯生生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把头巾解开，披在肩上。一头浓浓的乌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圆圆的脸庞，褐色的双眼。在她身上有着某种南方人的特征，也许是高加索一带的人吧。戈利斯特请她自我介绍一番。

“我叫塔玛拉……塔玛拉·库拉金娜，跟丈夫姓……”这位妇女气喘吁吁，断断续续说道。

她说话带有一种浓重的摩擦音“r”。一般乌克兰

和俄罗斯南部的人说话时都是带这种腔调的。

“在汽车制造厂工作，打字员。”库拉金娜继续自我介绍。戈利斯特已经注意到她的指甲修长，然而那双手却是宽宽的农民的手。

“侦察员同志，您知道，我的妹妹失踪了……尼娜……”库拉金娜克制着自己的激动心情，说得有些语无伦次。

“多长时间了？”

“已经有半年时间了。”

“您能否说得更确切一些？”

“杜纳也斯基说，她是去年7月12日离开他的。”

“这个杜纳也斯基是谁？”

“是谁？”库拉金娜感到奇怪，“她的丈夫。您大概知道他吧，他本人是位医生，但在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工作，在彼得洛夫卡街38号，检查被害的人和受伤的人。一句话，帮助民警局……”

前几年，戈利斯特在莫斯科州法院当侦察员，负责监督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的工作（当时侦察员还隶属法院）。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认识杜纳也斯基的。他确实是莫斯科刑侦局的一名法医。即使现在戈利斯特有时也常常因工作关系，断不了要和杜纳也斯基见面，打交道。这是个沉默寡言、稳重矜持的人，甚至有点目空一切，他在自己的事业方面

是个优秀的专家……

“您说什么，是法医杜纳也斯基？”戈利斯特感到很惊奇，不由得插问了一句。如果失踪者的丈夫在这样的机关工作，上帝自会安排他自己去寻找死者，为什么库拉金娜来找检察机关帮忙呢？

“是啊！”库拉金娜回答说，一边从手提包中掏出一块花边手绢，“我就只有一个妹妹，”库拉金娜低声抽泣着，不断用手绢擦眼泪，“她也就我一个……”

“请安静些，不要太难过了。您说说，为什么您认定您妹妹已经失踪了呢？”戈利斯特温和地慢慢问道。

“杜纳也斯基自己说的。他说，8月底已经给民警局递交了声明，照片也交给民警局了……为了查找……”

“您是不是很少和妹妹见面？”

库拉金娜深深叹了一口气说：“过去几乎每天见面，可是后杜纳也斯基开始反对……”

“什么原因……”她重又叹了口气，“尼娜年轻、漂亮，比他小10岁。好象有些妒忌……”

“对您？”戈利斯特很感惊奇。

“可不，我想给尼娜安排个工作，可他反对……”

“怎么，她没有工作？”

“杜纳也斯基……”库拉金娜把手一挥，欲言又止，“一句话，简直把她拴在自己身上……我偷偷教会尼娜打字……干吗要她老在家里呆着？您看得见，周围的一切都在大变啊！姑娘们为了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甚至奔赴远东。而他，简单说，去年3月，杜纳也斯基和我的丈夫大吵了一架。我丈夫在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当钳工。他叫费多尔……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尼娜和杜纳也斯基来了，费多尔好象是和他开玩笑似的说，‘杜纳也斯基，您把自己的妻子简直当成公主一样关在闺房里。’他可就大发雷霆了，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管我……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吵了起来，互不相让，差一点要打起来。杜纳也斯基带着尼娜‘啪’的一声就摔门走了。打这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妹妹了。我自己简直是傻瓜，也不给她打电话，觉得她是妹妹，应该尊重姐姐。而尼娜显然害怕了……突然有一天杜纳也斯基自己到我们家来了，我们一起在桌边坐着，我记得这天是7月15日，是我丈夫领工资的那天……我想，他是来讲和的，只是让人奇怪的是尼娜没有来。而他，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眼睛也凹进去了。叫了我一声后问我，知不知道尼娜在哪儿，

说尼娜离家出走已经三天了……我顿时吃了一惊。当时我们请他吃饭，可他拒绝了……”

“这么说，打那时起已经过去半年了。”戈利斯特说道，“那么以后呢？”

“杜纳也斯基走了。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来电话，总是问有没有尼娜的消息。”库拉金娜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也许她到你们哪位亲戚家去了吧？”戈利斯特稍稍停了一会儿，让库拉金娜安静下来后接着问。

“侦察员同志，您可不知道，我们的亲人中只剩下一个老妈妈了，她的一双眼睛几乎全瞎了，当时我立即给她那里去信了，但是她一点儿也没有听说尼娜的消息，尼娜没有上妈妈那儿去。”库拉金娜挥了挥手。

“您母亲住在哪儿？”

“在巴塔伊斯克近郊的集体农庄。”

“你们是从那里来的吗？”

“我们是罗斯托夫人。战争期间，我们失散了，尼娜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孩。我们白天沿街要饭，晚上在地窖过夜。真是命运不济。”库拉金娜深深地叹了口气，“幸好没有当小偷，没有走上邪路……后来我们被送到保育院。以后妈妈就找到了……”

“尼娜比您小几岁？”戈利斯特问。

库拉金娜低声地说：“我比她大三岁。”

“您给您们的熟人都去信问了吗？”

“全写了。还给我们罗斯托夫的女朋友格拉莎写了信。我们一起在保育院受教育的。她现在是教师。还给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个女朋友也发了信。”

库拉金娜打开手提包，拿出两个折起来的信封和信文。

“这是她们的来信，都说尼娜没有在她们的那里。再说，尼娜已经很久不和别人通信了。”

“杜纳也斯基对尼娜的失踪是怎么想的？”

“他脑袋中想些什么，我可就知道了。”库拉金娜久久地看着窗户，“他会再找一个的，男人，他们在老婆活着时还东张西望的……确实，他向我发誓说，如果尼娜回来，他们一定不会再象过去那样生活了，全要变个样。只要她愿意，就让她工作。”

戈利斯特也知道，打字员很缺，到处是招收打字员的广告。没有一天《晚报》不登载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有的人还按老习惯，称女打字员为打字小姐……

“那您自己的看法呢？”戈利斯特问，“您妹妹不会抛弃杜纳也斯基而和别人私奔吗？”

库拉金娜对这件事根本想都不想，因此坚决地摇摇头。

“也许她有什么外遇吧？”侦察员继续问。

“那尼娜也会告诉我的。”库拉金娜叹了口气，突然间压低声音，恐惧万分地说：“也许，她的敌人？”

“什么？”戈利斯特感到莫名其妙。

“您看，周围这么乱糟糟的……报纸上不是老写这些……”

“您瞧您的，她不是敌人的对象……”戈利斯特微微笑了笑。

在尼娜失踪案中，侦察员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政治色彩。

戈利斯特建议库拉金娜写份声明，把发生的情况全都写上。库拉金娜只写了一页纸，但主要意思都反映出来了。当她正准备走时，戈利斯特向她要了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

“只是恳求您，如果打电话，请别说是检察院，否则别人会以为……”库拉金娜用一副请求的语调说，可突然又停止了，觉得不好出口。

“那是当然。”戈利斯特连忙说，让她好放心。

库拉金娜刚刚走，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急速的碎步声，突然办公室里闯进了儿子沃洛加。他歪戴着的护耳皮帽上银白色的雪花闪闪发光，两颊通红，一双小眼睛显得很淘气，很活泼。

“你？……一个人？！”戈利斯特感到十分意外，简直有些不知所措。突然间他才想起自己完全忘记了妻子交待的任务，可又感到奇怪，难道是儿子自己来找他的。

“和妈妈来的。”儿子用手指着外面，郑重其事地坐到父亲办公的位置上。

一会儿，妻子走进了办公室。

“真对不起，你知道……”戈利斯特开始为自己辩解。

但是妻子只是莞尔一笑。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她已经习惯了丈夫从不清静的、辛勤的工作。因此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就理解这一切。

她知道，当他全神贯注新的案子时，他总是这样专心致志，什么也不过问的。

“坐一会吧。”戈利斯特请求妻子，显然他想起最近以来他很少和家人一起团聚。常常是他们母子还在梦乡时，他就起身离家，一直到深更半夜方迟归来。

母子两个双双坐了下来。

呆了一会儿，妻子轻声地问：“案子复杂吗？”
“不知道，有个人失踪了……”戈利斯坦率地承认。

“怎么会这样？跑哪儿去了？”

“妻子抛下丈夫走了……”

“丈夫是什么人？是醉鬼吗？”

“医生，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奇怪，”妻子说，“据我知道，一般是男人抛弃妻子，去找年轻的女子……”

“这怎么说……”

“走了，就走了吧。这关你们什么事？难道侦察员还管这些？”

“如果她还健康地活着，享受着生命的欢乐，那当然好。”戈利斯特不由得笑了笑，“然而，如果……”他没有说下去。

库拉金娜的妹妹已经失踪7个月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个相当令人不安的预兆，因而使戈利斯特格外警觉。

“然而，这个‘如果’后面是什么，你会知道的，会搞清楚的。”妻子拥抱着丈夫疲惫不堪的双肩，深信不疑地说。

“我明白，应该……不过，比如医生吧，他们也应该……但是，难道他们不会遇到一些困难？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

“当然会有。”

“这就对了，医生还这样！他们可全是大学毕业的程度。而我呢，只学了两年，没有毕业……”

“这可不一样，和别人比，你又有经验，又有文化……”妻子含情脉脉地说。

沃洛加显然不耐烦坐在桌子后面了，因此跑到父亲跟前，爬到父亲的腿上去上了。

“你猜猜，星期日我们准备带你到哪儿去吗？”

“看马戏？”小家伙高兴得大叫起来，“看卡考！”

“对，猜着了！”戈利斯特哈哈大笑。“只是不叫卡考，而叫科科，还有他的朋友雅科比诺，懂吗？”

“懂。”儿子点点头，“这是妈妈早晨告诉我的，我是故意把这个小丑叫卡考的。”

科科和雅科比诺是第一国家马戏团两位演丑角的滑稽演员，是当时莫斯科孩子们最喜欢的两个丑角。这个马戏团在花园街。

……戈利斯特把妻子和儿子送到了大门口，又回到办公室，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文化……”他想起了妻子的话，不由得笑了。过去的生活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际。

戈利斯特的父亲是科洛姆纳机车厂的工程师。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戈利斯特对于和父亲分别时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父亲的话语仍然萦绕在耳边：假如他回不来了，儿子无论如何要继续学习。

父亲去世后，戈利斯特从科洛姆纳来到彼得堡找姑姑，她是父亲唯一的亲人。1920年，戈利斯特自愿参加了红军。先后在保安部队和装甲旅服役，并被提升为上尉指挥官。复员后被送到司法训练班学习了一年。

以后，在莫斯科州法院当侦察员。

从1931年起，戈利斯特就担任莫斯科市检察院侦察长。确实，论经验他绰绰有余，但文化，离科学院院士却远着呢！不过，他的许多同事，在经验和文化方面却比他少得多。因此他的妻子当时确实有“权利”把他称做院士。然而他自己知道，任何一件案子都是和未知数打交道。有时，甚至一些富有经验和知识的人也会显得无能为力的。那时，一件件案卷就会带着“保存到×年×月”的签字而归卷存档。这些案件，有的人称之为“死案”，有的人叫它为“聋案”，而正式名称是未侦破的案件。这就是说，侦察员吃了败仗。犯罪分子很狡猾，或者是客观情况对犯罪分子有利。然而最主要的是丧失了时机。尼娜案件就是这种情况。从她失踪以后过去已经半年多了，这个时间可不短！

2

第二天，在会见库拉金娜之后，戈利斯特给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副局长特尔涅尔打了个电话。因为这件事涉及该局工作人员有关的一位法医，所以就更应该格外谨慎从事。

戈利斯特要求把有关杜纳也斯基声明妻子失踪的调查案卷寄给他，并要求对杜纳也斯基本人以及刑事侦察局其他工作人员严格保密。一小时后，案卷已摆在戈利斯特的办公桌上。

杜纳也斯基的声明是去年8月20日写的。他在声明中宣言，尼娜是在7月12日离家出走的。

戈利斯特一边看这份令人伤心的材料，一边暗暗思量着：几乎7个月来，杜纳也斯基整日焦虑不安，得不到任何消息。整整7个月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疑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并令人难堪地对待他……

杜纳也斯基写道，她和某一个人悄悄出走，去向不明，这个人他虽不认识，但毫不怀疑这个人是

有的。妻子没有留下任何字条，没有告诉任何熟人，包括亲姐姐，她要去什么地方及出走的原因。离家时，尼娜带走了自己的全部东西，以及杜纳也斯基的4000卢布现款，价值3000卢布的公债券，金表及其他物品。

杜纳也斯基试图寻找妻子，他给岳母和妻子的朋友们写了信，但所有的回信全都一个样：尼娜没有到她们那儿去，她的行踪一概不了解。

为了便于查找，杜纳也斯基在声明中附了妻子的照片，并洗印了50张。

案卷中有许多查询材料、电报，但有关尼娜的却杳无音信。

戈利斯特仔细查看了尼娜的照片。一张是正面像，另一张是半侧身照，第三张是全身照，穿着轻盈的夏式连衣裙。第四张身着皮大衣，双手插在皮手笼里。从照片上看，尼娜特别象姐姐，只是尼娜的身材更苗条，头发微微有些髻。她外表比库拉金娜更迷人。而且库拉金娜在谈话中也直言不讳，妹妹比她更漂亮。

几乎在所有的照片中尼娜都是面带笑容，有点象孩子似地微微张开漂亮的嘴巴，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总之，从像片上看，她的外表诚实、朴素。不过戈利斯特已经养成了不特别注重外表的习惯。在他面前常坐着一些有偷窃行为的姑娘，她们有着天使般的面庞。而一些嫌疑对象却面孔阴郁，如果按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刑事犯罪学家隆勃罗佐的观点来分析，这些人是爱好搞刑事犯罪行为的，而事实上他们都是些诚实人。

根据杜纳也斯基的声明，妻子离家时随身带走了现钱和贵重物品，甚至他的金表。这一情况引起了戈利斯特的警觉。根据办案过程中得到的材料，虽说可以提出某些一般性的看法，但要得出明确的设想为时尚早。

第一，尼娜确实抛弃了杜纳也斯基并与某个杜纳也斯基暗示的情人出走了，并精心地隐藏了去处，以防止丈夫突然出现而大闹一场或做出什么蠢事。

第二，尼娜已经死去。不过是凶杀还是不幸的事故，暂时只是猜测而已。因为缺乏主要的依据——未发现尼娜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名侦察员，哪怕是稍稍有些经验的侦察员都非常清楚，这是一件难度极大的案件。可以随意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或假设，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前研究众多的假设——这是繁重而且往往是收效甚微

的工作。

戈利斯特又拨通了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的电话，确切地说就是副局长的电话，问他：

“特尔涅尔，是这么回事，在查找尼娜的案卷中，杜纳也斯基的材料说，他妻子是7月12日失踪的，在递交声明前的几乎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没有把这件事向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

“谁乐意承认妻子被人拐走呢？”副局长说，“他是一个爱面子的男人，看来是难于启齿，也许是在等待，认为，妻子一定会迈开双脚回来的……。”

“但毕竟还是递交了声明。”戈利斯特指出。

“正象您自己说的——晚了一个半月。这意味着担心战胜了要面子和自尊心……。”

戈利斯特答应到刑侦局去一趟，可是直到下午才得暇前往彼得洛夫卡街38号。他很想知道了解一下，在尼娜失踪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民警局所属各单位登记的各种发案卡片资料。戈利斯特对无人认领尸体的各种通告和案件特别注意。

当然，戈利斯特明白，负责查找尼娜的刑侦局侦察员们早就把卡片从头到尾翻遍了，也许还请杜纳也斯基辨认了几具尸体，但戈利斯特仍然决定亲自再检查一次。

这一枯燥的工作已使他花费了大约三小时的时间，在即将结束时，侦察员突然发现了一份业务工作报告，这着实使他大吃一惊。

也许这是侦察员特有的第六感觉，也许是多年养成的要核对事实与日期的习惯。

去年7月13日，在离莫斯科六公里的北方铁路雅乌兹车站站台附近，发现一包被支解的女人肢体。包内是附着两片肺叶、心脏和脾脏的胸腔，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7月13日！

戈利斯特的头脑中立刻浮现出另一个日期——7月12日。在这一天，杜纳也斯基声称尼娜失踪了。难道是她吗？

戈利斯特继续查阅卡片。另一份报告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又是7月13日！在波尔舍夫公社附近的森林里，（还是在那条北方铁路沿线）又发现女尸的部分肢体——小腹和骨盆。肢体包在一张绣有字母“H”的床单里。

这两起重要的发现都在同一天！

但这还不是全部。

7月25日在洛西纳岛森林的沼泽地里（在雅乌兹和波尔舍夫之间）发现一颗被剥了皮的女人头骨、

颈椎骨、两只脚掌、两块扁胛骨、两只被砍掉一个手指头的手。

最后又发现两块从大腿上剥下的皮。地点离第一个地点不远，在离北方铁路也只有六公里的波加洛森林里。

发现的日期为8月28日，也就是在杜纳也斯基向莫斯科刑事侦查局递交关于妻子失踪声明的前一天。

戈利斯特当时就试图查明对这些可怕的发现是如何处置的。何人何时受理这些刑事案件？被支解的尸体送到哪儿去了？这些肢体是同属一个人的呢，还是分属几个人的？

但遗憾的是，戈利斯特只了解到它们（肢体是不同的民警分局收集来的）已被送往列佛托夫斯基陈尸所，无名尸体通常都是往那里送的。

戈利斯特立即驱车前往。到那儿已是快到下班时间了。陈尸所主任谢苗诺夫斯基博士正准备要走。

戈利斯特同莫斯科、甚至其他地方的许多侦察员一样，非常了解谢苗诺夫斯基，他在陈尸所工作了4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故、不幸和悲痛。然而他依然是个善良可亲的人。精于本职工作、观察敏锐的舍伊宁曾经不止一次地、真心实意地回忆起谢苗诺夫斯基。他这样写道：“这么频繁地与死人打交道以至都能善于分析活人的心理状态……。”

戈利斯特请求谢苗诺夫斯基晚走一会。

“行行好吧！”谢苗诺夫斯基乞求说，“明天不行吗？”

“一般说嘛……”戈利斯特刚要开口。

但谢苗诺夫斯基打断了他的话：

“好吧，那就请说出来吧！”谢苗诺夫斯基象所有的内行人一样，非常清楚侦察员为什么要光顾陈尸所。而他仿佛抱歉似地说：“汽车在等着，要去波多里斯克验尸……。”

为了不耽误谢苗诺夫斯基的宝贵时间，戈利斯特开门见山地说：

“您是否还记得去年七八月间曾四次把一些被支解的肢体送到您这儿来？这些肢体都是在北方铁路沿线发现的？”

“怎么啦，记得，”谢苗诺夫斯基点了点头，“是的，有……。”

在戈利斯特听起来，这个词仿佛是个不祥之兆。他觉得“有”意味着“完了”。

“它们怎么啦？在哪儿？”他急急忙忙地问道，虽说他也明白肢体可能早已被送去埋掉了。

“谁对它们都不感兴趣，”谢苗诺夫斯基回答说，“说实话，当时使我感到吃惊，至今仍使我惊奇不已。”

“那么说它们……”戈利斯特精神为之一振。

“在我们这儿，就在我们这儿，亲爱的，都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等待有朝一日，有人会想到它们。”

“上帝保佑——”戈利斯特不由得脱口而出。他真是感到如释重负。这么说，还不是全无下落。

“您知道吗？”谢苗诺夫斯基接着说：“我曾想亲自进行调查。但领导劝阻我说，没有必要去找额外的事，因为没有任何人委托……”

戈利斯特明白谢苗诺夫斯基的头脑中已经有了些想法。他经验丰富……

“您有什么见解？”戈利斯特很感兴趣地问道，“这是同一人的肢体吗？”

“我不想猜测，记住明天我给您打电话。”他边穿大衣边说，“可别忘了办理进行法医鉴定的命令。”

“那么，明天什么时候？”

“一大早。”谢苗诺夫斯基说。

“不知疲倦的老头。”分手时戈利斯特心中想道，“晚上检验尸体，这就是说，接着就要回到这儿来再继续工作。”

戈利斯特毫不怀疑谢苗诺夫斯基黎明前会满足他的要求。他知道，谢苗诺夫斯基从来不以长者自居，不论任何季节，白天黑夜，时刻准备赶赴现场，或前往其他城市亲自处理复杂的案件。

第二天早晨，戈利斯特刚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了谢苗诺夫斯基的电话。好象身居异地的法医能预感到侦察员什么时候来上班似的。谢苗诺夫斯基的声音显得疲乏不堪。

“这是同一个人的肢体。”他说，接着又补充道，“女人的，约25岁左右。”

“25岁左右？”戈利斯特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

尼娜也正是这个年龄。

谢苗诺夫斯基沉默片刻。

“是的，误差可能在一至两岁之间，不会再大了。”最后又说，“也可能小些，也可能大些。”

戈利斯特心情激动，这种激情是每个侦察员都熟悉的：当他的设想，尽管是最初步、最模糊的设想开始形成某种轮廓时，他的心中总是格外不平静。

“您说是一个人的肢体？”他重复了一遍，而头

脑中却斗争得十分激烈：让谁来辨认死者——杜纳也斯基还是尼娜的姐姐库拉金娜……

“您不相信吗？”谢苗诺夫斯基的声音中略带责备的口气，“那么您亲自来认定吧。”

“不，您太客气了，谢苗诺夫斯基，我毫不怀疑。”戈利斯特赶忙说，“大概三个小时后我到您那里去，行吗？”

“欢迎。”谢苗诺夫斯基回答，并再次提醒侦察员办理法医鉴定的命令。

“究竟和谁同去陈尸所合适呢？”侦察员苦苦地思考着。他想起了和副局长的谈话，反复衡量各种利弊，最后决定选择库拉金娜同去。“这样更近人情。”他想。

戈利斯特给还在上班的库拉金娜打了个电话，并说，马上到她那儿去。库拉金娜显然不安起来，并问：

“一定得现在吗？如果下班后我亲自到您那儿去行吗？”

“很抱歉，必须现在去。”戈利斯特说。

经侦察处处长的批准后，他要了一辆公车到工厂去了。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白茫茫的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夜，仿佛想把整个莫斯科都盖上似的，一直盖到每一棵树的树梢，盖没每一座教堂的金色圆顶。近年来，随着高层建筑到处在拔地而起，教堂的金顶似乎显得矮了，也不那么宏伟了。

“M”牌卧车在从达尼洛大桥驶向汽车厂大街，超越一辆卡车时陷入了雪堆，车轮直打滑。司机骂街了，他一会儿把车向前开，一会儿向后倒，但毫无结果，白费力气。好象为了嘲讽“铁马”似的，一辆马拉爬犁从他们旁边驰过。车夫身穿光面皮袄，戴着大手套，精神抖擞地驾着爬犁。爬犁上坐着一对年轻人。

“瞧，我们可在老爷车面前出丑了。”戈利斯特对司机开玩笑地说。

司机什么也没有说，他猛踩油门，汽车似乎也感到难为情，终于开动了，摇摇晃晃地在路上行驶着，很快就赶上了爬犁。

“它该进博物馆啦。”司机嘟囔了一句，“过时了……”

他胜利地按了按喇叭，得意洋洋地超过了爬犁。

为了使库拉金娜免受各种怀疑和可能遇到的麻烦，戈利斯特先来到汽车厂干部科，门口有十几个人正等待接见。大部分都是小伙子 and 姑娘们，他们

身着短皮袄，女式棉坎肩，丝织头巾，毡靴和手套。

“一天之内要接收100到150人参加工作。”干部科长自豪地对戈利斯特说，“常言说得好，正该如此，我们工厂有力量吗！”

戈利斯特讲明了来意。他们派人去找库拉金娜了。戈利斯特在走廊里见到她，把她带到一边。

“有消息吗？”库拉金娜不安地问。

“不好说，”戈利斯特含糊其词地回答，“但您现在必须跟我走一趟……”

他决定在路上再说明去处和原因，但事先要让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侦察员同志，这怎么行？”库拉金娜不知所措地说，“他们也不会准我假的啊！我们正在搞竞赛，就连午休时间都决定缩短了十分钟，为了生产更多的汽车……”

“库拉金娜，要知道，您必须去。”戈利斯特严肃地说，“至于领导吗，”他向干部科那边点了点头，“我已说妥了。”

库拉金娜从他说话的口气中明白，事情确实刻不容缓……

……车子默默地行驶着，库拉金娜心情沉重而不安，不知是因为突然让她离开工作，还是因为生平第一次坐小卧车。戈利斯特思考着应该怎样来告诉这位同路人，她将要面临的考验。

戈利斯特知道，召请亲属或熟人去辨认尸体，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每一次他都看到，每个人都是带着一种揪心似的紧张气氛跨进停尸房的门槛的，就连侦察员本人也习惯不了这种昏暗的灯光，带潮味的凉气。戈利斯特发现人们总是尽快地走过放着死者的停尸台，神色慌张，极度恐惧，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库拉金娜正面临着感情上的强烈冲击。

司机疑惑地看了看戈利斯特。

“先回我们那儿去。”戈利斯特立刻简短地回了一句。当然可以直接去陈尸所，但戈利斯特还是决定应该和库拉金娜谈谈，使她逐渐领悟到今天对她有些什么要求。然后就给谢苗诺夫斯基打个电话，准备认尸。

清洁工们身上沾满了湿润的雪花，缓慢地擦着正面的玻璃窗，不时弄出嚓嚓的声响。沉默使人产生一种压抑感。

“尼娜和杜纳也斯基是怎样相识的呢？”戈利斯特问。

“在我们工厂的俱乐部。”库拉金娜回答说。

“你妹妹也在那儿工作吗？”

“不，尼娜从巴泰斯克市来看我……我们在俱乐部举办苏联医学成就讲座，报告后象往常一样，有舞会……我想让妹妹看看，我们是怎样有修养地消遣时间的……尼娜没见过世面，她说准会出丑的。她甚至都没有连衣裙，裙子是缎纹布的，而短衫是蓝布做的，平底布鞋却是用牙粉刷白的……我说，好啦，这些难事可以帮助解决。我带她去了理发馆，把自己的丝绸连衣裙给了她，还有尖皮鞋……尼娜照着镜子，简直认不出自己了。”库拉金娜叹了一口气，“她简直就象一位电影明星……我们去了俱乐部，我们的小伙子全都瞧得发呆了，真把我和费多尔折腾苦了，介绍了一番又介绍一番……当时做报告的是杜纳也斯基。当舞会开始时，厂工会主席劝他留下了……我和费多尔跳舞，回头一瞧，我的妈呀！尼娜正和主讲人跳舞哩！我想，小丫头可有机会了。可是她却很不好意思，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总是低头看着脚……在巴泰斯克，那里谈得上跳舞？都是些民间的老玩艺儿！可杜纳也斯基邀请她跳华尔兹……”

“跳完舞，杜纳也斯基领着尼娜找到我和费多尔，正式做了自我介绍……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始终没离开她。第二天是星期日，他邀请尼娜去看电影……以后又是看戏，逛公园，划船……只过了两个星期就上登记处去了。我和费多尔考虑给她办点嫁妆——两件连衣裙，一双鞋，几件衬衣，把姑娘许给这样的人没有点象样的嫁妆可太难堪了。我们存钱本要买辆摩托车，愿上帝保佑他们，摩托车以后再说……我还把自己的宝石戒指给了尼娜，那是绿松石的，是妈妈送给我的，又是外祖母传给她的……我说好妹妹，戴上吧，会幸福的……”

“结婚仪式是在杜纳也斯基家里举行的，晚上的婚礼办得俭朴。尼娜请了我和费多尔。在这儿她还有什么亲人？杜纳也斯基请来几个朋友。我记得有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医生，名叫博林。还有我们工厂的一位工程师赫鲁明和一个军人。至于还有谁，我可没记住……”

他们来到了检察院。戈利斯特请库拉金娜到他的办公室去，并嘱咐司机，他们马上还要走的。

戈利斯特递给库拉金娜一张白纸和钢笔，请她把 she 记得的妹妹身上的特征，如胎记、伤痕、疣等等写出来……

“这是为什么？”库拉金娜惊恐地问。

“需要，库拉金娜，明白吗？需要的。”戈利斯特

和气地说。

戈利斯特让她一个人留在室内，自己到隔壁房间给谢苗诺夫斯基打电话，说他们将去认尸，确切地说是认所保存的那些肢体。

“您说要来辨认吗？”谢苗诺夫斯基又问了一次。

戈利斯特感到在他的语气中隐藏着某种疑虑。

“是啊……顺便问一下，谢苗诺夫斯基，您在观察尸体时发现了什么特征，如胎记、疤痕等等？”

“怎么对您说呢？”医生犹豫不决地说，“没有，没有这些特征，无论是胎记还是疤痕，什么也没有……”侦察员觉得医生的口气似乎没有什么把握。

“怎么？没有？”戈利斯特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是这样……全都切除了……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沉默了。戈利斯特也默然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简直使他惊呆了。

“喂，您听到了吗？”谢苗诺夫斯基冲着话筒大喊一声。

“听得很清楚。”戈利斯特大声回答。“我认为……”

“请来吧，我们一起商议，人多智广……”

“过一小时我就到，如您不为难的话，请找几位证人。”

“好吧，戈利斯特……”

戈利斯特回到库拉金娜那儿，看了看她写的材料，字写得很大，象是小孩写的。

“也许我最好用打字机打出来？”库拉金娜看着桌子上的打字机，象是表示谦意地问道。

“没关系，没关系，认得出来。”侦察员安慰她说。“您这里写着，胎记在乳房下边……左乳房还是右乳房？”

“左边的，就是左边的，在心脏下面……”

“请写上吧。”

库拉金娜按他的要求写了。

办完这件事后，戈利斯特终于拿定主意，说道：

“库拉金娜，现在您要鼓足勇气，我们走吧……”

她惊慌失措，瞪大眼睛看了一下侦察员，极其轻声地问道：“去哪儿？”

“到列佛托夫斯基陈尸所。”

库拉金娜的脸似乎立刻变瘦了，她出神地沉思起来，一路上都沉默不语。

戈利斯特把关于对去年夏天在北方铁路沿线发现的尸体残肢进行法医鉴定的命令交给谢苗诺夫斯基。

谢苗诺夫斯基已找到了证人。他们是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和陈尸所的一名卫生员，医生还考虑到库拉金娜，所以让一位护士参加认尸工作，以免一旦库拉金娜发生意外，准备随时进行救护。

库拉金娜真的昏倒了，但那是在主要事情办完之后。由于犯罪分子把尸体上的所有特征全都切除了，所以辨认工作十分困难。此外，库拉金娜根本不能断定这是她妹妹的肢体。在这种努力似乎已经一无所获时，她突然发现了脚上的一个疤点。

“这是，这……”她说，“伤疤……这好象是耙子扎伤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田野里跑着玩，不知是谁把耙子忘在地里，耙齿朝上，小尼娜无意踩上了……”

说到这里，库拉金娜就昏倒了。

在她苏醒后，当需要书写辨认记录时，戈利斯特对库拉金娜好不容易发现的这个女人右脚根上的小伤疤的可靠性再次予以核实。但她仍旧常常使用诸如“好象是她扎伤了右脚”，“大概这个伤疤是因为那次受伤留下的，但记不清楚了”，“尼娜没请医生治伤”，“尼娜受伤之后，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她脚上的伤疤，但我认为这就是那块伤疤……”戈利斯特极其客观地把这些“好象”、“大概”、“我认为”全写进记录中，尽管他非常清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会使证词和认尸工作变得一钱不值。但他也懂得，只有象姐姐这样的亲人才能够回忆起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耙子扎伤事故。可是所有这些保留条件也证明了库拉金娜证词的公正性。但是凶手为什么不怕日后辨认尸体，而留下了这个特征没有去动呢？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或者就象谢苗诺夫斯基一样，对它没有注意。

“为什么，为什么？”库拉金娜在谢苗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嚎啕大哭，“哪个歹徒下的手？让他的手烂掉吧！他不得好死！”

看着这位痛不欲生的青年妇女，戈利斯特就觉得眼前浮现出一幅图画：阳光普照田野，一望无际的蓝天，两个小姐妹在草地上奔跑着，欢笑着。

难道其中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悲惨地被夺去了吗？！

库拉金娜停止哭泣了，她精神恍惚，木然不动。这通常是精神受到了强烈刺激后的表现。戈利斯特托付护士好好照顾她，并决定和谢苗诺夫斯基谈一谈。

“一眼就看出这是行家里手干的，”法医说，“外科医生或是病理解剖学专家。知道在何处下刀子。

尸体分割得很内行！可以说，这是共同的意见……”

“非常重要。”戈利斯特点点头，“但是根据什么呢？”

“第一，用的是手术刀。并且很内行。使人感觉到经验丰富。第二，支解尸体之前进行了无血处理。请注意，每一块尸体都是发白的。他知道，当要把肢体弄走时，不能让它滴血。他不想留任何痕迹。”

“那就是说您认为，这种做法，具体说，无血处理只有医生才能办到？”戈利斯特问。

“毫无疑问！”谢苗诺夫斯基斩钉截铁地说。接着又说：“第三，是尸体上的切口，凶手事先考虑到一切情况，尽量不留下任何特征。在电话中我就跟您说了——没有任何胎记，没有任何疤痕……”

“那在脚掌上的呢？”

“亲爱的，起初我自己把这块伤疤当成一个茧子，一个硬块。”谢苗诺夫斯基叹了一口气，“常言说得好，谁人不出错呢。”法医耸耸肩膀，“我们都是人，出错是很容易的。现在我也看清楚，这是伤疤。为了以防万一，我用显微镜仔细地观察了切口……但是，我相信，这是伤疤……您知道，在法医史上这是第二起类似的支解尸体案。您明白吗，第二次！”谢苗诺夫斯基郑重其事地说。

“您指的是什么？”

“这样技术熟练和有预谋！”

“第一起呢？”

“第一起……第一起……亲爱的戈利斯特，发生在英国。罪犯原来是个叫什么雷格斯顿的人。是一位医生。”谢苗诺夫斯基眉头一皱，“非常惨，不是寻常案件。至于终生不渝的誓言？不，您想想，一双手接触人体是为了治病，是为了伟大和神圣的使命行医，可这双手却亵渎医生的荣誉，去行凶杀人，您能想得到吗？而且是那么凶残！”

“我完全理解您。”戈利斯特点了点头，“罪行是凶残的。凶杀永远是骇人听闻的。如果凶手是医生，这种罪行就加倍地令人厌恶。”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

“还有，”谢苗诺夫斯基接着说，“我想请您注意一个关键的细节。所有的尸块大小都差不多。”

“会不会是巧合？”戈利斯特问。

“我认为不是。”

“您想说……”

“我想说的都已经说了。可做结论是您的权力。做为侦察员……好啦，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一切。

还有问题吗？”

“大概没有了。”戈利斯特说，“那正式结论呢？”

“写一篇，会写的。”法医叹了一口气，“要是没有它也不行……说实话，还没有写，以前哪有时间啊？现在就写……”

“我请求您，关于切口的分析要尽可能详细些……”

“我的老弟，”谢苗诺夫斯基见怪了，“难道我……”

“请原谅，谢苗诺夫斯基，”戈利斯特笑着说，“无非是希望一切……”

“一切，管保您一切都满意。”谢苗诺夫斯基向侦察员保证说，“临近下班时，鉴定就会写好。盖上公章，签上名……”

与法医专家说完之后，戈利斯特的脑海中各种念头纷纷涌现，一个接一个。如果发现的肢体是尼娜的，立刻又产生下列问题：是谁杀害的？目的是什么？

罪犯不知不觉暴露了马脚。不错，尽管只是指出了职业：医生。但是这已经是进行侦察的重要线索。“尼娜的丈夫是医生，所以他就是凶手。”戈利斯特无论怎样尽力驱赶这个念头，但它总是在戈利斯特头脑中纠缠不休，他觉得这种想法妨碍他客观地考虑问题。

戈利斯特现在深深感到时间在飞逝。用象棋运动员的行话来说：思索时间不足。凶杀案发生至今已7个月。这对罪犯真是一份过于奢侈的礼物。

戈利斯特忍不住要尽快地再次问问库拉金娜。至今为止，他们在谈话中只是涉及有关与她妹妹尼娜生活有联系的一般性问题。现在必须彻底考察她生活的每一个进程，尤其是最近几个月的，了解她所接触的人们及搞清她的爱好。

当戈利斯特和她坐上汽车回检察院以便进行进一步询问时，他明白了库拉金娜现在不能再谈论这个刺痛心灵的问题。陈尸所的情景已经完全使她精神崩溃了。

侦察员决定明天和她见面。就在与库拉金娜告别时，他请求说：

“请绝对保密，任何人，请注意，对任何人要一字不露……”

“那么费多尔也一样？”库拉金娜抬起泪痕斑斑的脸，“他会刨根问底的……”

“想点其他的理由，我请求您……”

回到机关，戈利斯特马上去找侦察处处长。

听完侦察长的汇报和看了材料后，处长说：

“真是好样的！据我所知，我们单位这么能干的人过去真没有……戈利斯特，您的对手可不是等闲之辈。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就这样“尼娜被杀案件”立案侦察了，虽然它早就应该立案，但总是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发现被支解肢体的民警局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认为已由其他人做工作了。事实终究是事实，市检察院对这案件案子极为关注。

3

每当侦察员接办一起刑事案件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从哪儿开始？说实在的，戈利斯特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在他决定要尽量确切地查明凶杀时间，到底是哪一天。这是法医无能为力的，必须寻找其他方法。

杜纳也斯基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她妻子是去年7月12日失踪的，而第一次骇人听闻的发现时间是7月13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凶杀发生在哪一天，12日还是13日？

必须指出，在北方铁路沿线找到的一个包裹内发现一块沾有血迹的报纸。

成功地把报纸文字复原了。这片报纸的一面是小号铅字，能看出的内容是：

“……材料引人入胜地证明，配有爵士乐是正确的。我已在列宁格勒表演过这个爵士乐歌剧。从7月15日起，演出将在中央红军之家剧院进行。这仅仅是开始，但有一个条件是必须遵守的，演出单位应把喜悦、欢乐带上舞台……”

还有：

“……大发雷霆：
……糊涂的说书人
……和……邮筒
……把关系说明
……和难为情。”

另一面只剩下一则广告的片断。

“……全苏国际……摄制……莫……时

……”

辨认残肢后的第二天，戈利斯特一清早就去了区图书馆，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与肢体包中找到那片报纸同天的报纸，7月11日的《莫斯科晚报》，刊号158(3788)。

第一篇短文是乌乔索夫《我想歌唱什么》文章的片断。他是一位很有名声的歌手，电影明星及爵士乐队指挥。

乌乔索夫所提到的爵士乐歌剧《深色的斑点》在中央红军之家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

旁边刊登了格拉诺夫的诗歌讽刺小品《塔吉雅娜的信》。格拉诺夫写作技巧高超，作品辛辣，充满幽默。他叙述了在依里因休假，村内某人偷走钉在柱子上的邮箱。

“我给您写信，但我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才能到您的手中。也许明年五月前，在傍晚日落时分……。”

在另一面，这是晚报的第四版，碎纸片上的是下述广告的片断。广告全文是：

“请看，请欣赏故事片，全苏国际电影贸易公司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时代》，查利·卓别林身兼编剧、导演、作曲。查利·卓别林和波列塔·戈达尔德，对话全部译成俄语。”

戈利斯特和妻子、儿子在《突击手》电影院看过《新时代》。全家看完电影后，沃洛加把父亲的帽子低低扣在自己头上，用扫帚代替手杖，模仿着卓别林的动作。他把喜剧演员的逗人姿态模仿得活灵活现。

去年的7月，夏天奇热，温度高达39℃，莫斯科的气候酷热难忍。每逢休息日，郊区列车总是超员运行，而在城里，人们散布在莫斯科河、水塘及小溪的岸边，光着身体乘凉。卖汽水的售货亭子边排着长队，冷饮工业总公司根本不用向莫斯科市民做广告，推销那种“清凉无比，到口就化，谁尝一尝，准会相信”的“密依巧克力”紫雪糕。冰激凌销售量非常大，报纸上经常刊登以罕见的酷暑为题材的漫画。

戈利斯特一边翻阅着图书馆的《莫斯科晚报》合订本，一边回忆起去年夏天所发生的一切。

回到自己办公室时，他把几个日期作了比较。

报纸是7月11日的，尼娜失踪是7月12日，头一次发现尸体的残肢是7月13日，时间相隔不长，可以说一个紧接一个。但凶杀发生的准确日期，暂时仍然是个问号。

在反复思考凶手的情况时，戈利斯特突然发现，凶手的行动中有人不解的矛盾。

关键在于所有残肢的包裹藏得相当不精心，罪犯只是马马虎虎用树枝把它们盖上，这与他力求精细地消除被害者身体上特征的行动截然相反。

他究竟为什么在另一种场合失策呢？

戈利斯特尽力构思另一种设想，凶手怎样处理尸体？很可能是不得不多次到城外去，一次只能藏匿四块大小相同肢体中的“一份”。

当谢苗诺夫斯基介绍所有的残体大小几乎都相同时，戈利斯特就曾想到过这一点。也许是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送出去的。那么，凶手是按照箱子的尺寸来切割尸体的？

结果是，他不得不沿北方铁路跑了4次。罪犯急于处理掉尸体，那他大概就得在一天之内做完此事。藏匿得马马虎虎只能用一词来解释，害怕——唯恐突然被发现。那么又为什么要这样精心地支解尸体，做无血处理，切去胎记和所有的特征呢？很可能是罪犯是在安全的地点作案并有足够的时间。

……将近11点时，库拉金娜按照传票的通知准时来了。戈利斯特立刻就发现了她身上的巨大变化。

痛苦常使一些人失去常态，意志消沉。而却使另一些人猛然醒悟，振作起来，使得他们重新考虑某些难以忘却的往事。

戈利斯特感觉到，库拉金娜已经为自己选择了某些新的，非常重要的做法。

“侦察员同志，请您原谅，前几天我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您……在您问起我有关尼娜以及她与杜纳也斯基关系怎么样时……”库拉金娜开始说。

“为什么？”戈利斯特问。

“这怎么向您说呢……您晓得夫妻之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有好事，也有坏事。有欢乐，也有争吵。而究竟怎样，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别人的家，外人是不知道的……我不想让您认为：我要把妹夫说得一无是处，而去袒护自己妹妹。但昨天的事情使我整夜没有睡觉，重新考虑了一切。说实话，家庭生活没有给尼娜带来欢乐，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您说的最近是指什么时候？”戈利斯特进一步问。

“准确地说就是这两年。整天哭个没完，她又是

个不好说话的人，再说向谁去诉苦呢？只有在我这儿才随便诉点苦。”

库拉金娜双手不停地扯着一块小手绢，但双眼却干干的，眼泪早已都流干了。

“她具体的都抱怨些什么？”

“问题就在这儿，我从她嘴巴里什么也没问出来，一来到我这里，就脸冲墙地躺在床上哭。我左问右问，她总是不说话。不过，显然是在家里事不顺心。有几次脸上还有青斑，手上有时也有。”

“这是他打的，杜纳也斯基！”库拉金娜手指着外面，愤怒地说，“那还能是谁？她整天坐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她就象佣人和保姆似地伺候自己丈夫。他呀，就只吃蔬菜和水果。肉，一点也不……”

“专吃素吗？”

“是啊！尼娜说她从一个什么作家的书里读过，吃动物是有罪过的。”

“托尔斯泰的吗？”

“好象是……就是他。尼娜大多是偷偷地到我这来的。如果在晚上，杜纳也斯基也跟着她来。她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检查过。为什么要检查呢？”

“是多疑吗？”

“凶狠！”

“也许爱得太深了吧！”

“上帝啊！这难道能算爱情？”库拉金娜提高了嗓门，“我这样认为，不管爱不爱，但是应该平等。我们受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继续说着，越来越激动，“为什么革命解放我们妇女？工作平等，总之……如果男人可以选择爱谁，和谁生活，为什么就要禁止我们呢？”

“怎么，尼娜喜欢上谁了？”戈利斯特小心谨慎地问道。

“我不知道。”库拉金娜又变得忧郁不乐了，“在任何场合，她什么也没有和我说起过，但杜纳也斯基……”她不说了。

“杜纳也斯基到底说了什么？”戈利斯特一再地问。

“他总是说，尼娜跟一个熟人走了……老实说，那时我真为尼娜感到高兴。想到她的眼泪、青斑，我认为，杜纳也斯基真是活该……7月15日，当他来我们家时，暗示这个人或许是博林。我对您说过，杜纳也斯基有这么一个朋友，也是医生……”

“说过。”戈利斯特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也许是博林，也许是赫鲁明。他是我们工厂的工程师，那天晚上也参加了尼娜和杜纳

也斯基的结婚晚会……如果真要是跟了博林，那是一回事。他是个光棍，而且是个讨人喜欢的男人。至于赫鲁明……他可是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啊！我想，尼娜难道会是这种没有良心的人？拆散别人的家庭，夺走孩子们的父亲……这叫我和费多尔怎么在工厂里呆下去？当然，我和杜纳也斯基什么也没说。就在第二天，我在工厂里打听了赫鲁明在哪儿的事，据说上星期他去休假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一切都符合了。我认定，他是休假了，到某个地方去了，没有带妻子去。她是我们厂的计划员……又过了一个礼拜。有一次我看见赫鲁明妻子的脸好象哭过似的。可是她不去寻找，不打听赫鲁明到哪儿去了？后来，我又间接打听到他不知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度假到期未归……”

“那么，博林呢？”戈利斯特饶有兴趣地问。

“对博林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见过他一次。”

库拉金娜沉默不语了。

“这是您想对我说的全部情况吗？”戈利斯特问道。

“不，还不是全部……”库拉金娜目光低垂，仿佛在决定什么，“不是全部，侦察员同志……我想说，要是有人传说，好象尼娜跟一个外国人走了，那么这简直是敌意的诽谤。我妹妹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分子瞎混！那怕是给她挂满金子，那也不可能，全讲完了！”

库拉金娜的这一声明使侦察员大感兴趣。但是，他未能搞清楚尼娜和这个天知道的什么外国人有什么联系的。但为了以防万一，戈利斯特在本子上写上：“通过国家政治安全总局核实。”

与库拉金娜的谈话看来已经结束了，因此侦察员注销了传票，站起来准备告别，这时库拉金娜眼睛看着一边说：“我不喜欢，真讨厌杜纳也斯基的行为。这叫什么呀，爱啊爱，可过了半年就忘了。”

“您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戈利斯特明白库拉金娜还没说完，又问道。

“就是那件事！要是您见过的话，起初时他简直是要死要活的，嚎啕大哭，说他不想要活了……可我在新年前去看他时，他说起尼娜就跟没事似的。”

“也许他把感情藏在心里吧？”

“难道我是瞎子吗？”库拉金娜稍感委屈地说。

“还有呢……我说过在婚礼上，送给尼娜的宝石戒指，您记得吗？”

“记得。”戈利斯特点了点头。

“我在杜纳也斯基家碗柜上的小高脚盘里看到了这枚戒指。可是尼娜时刻都戴着它……”

“请等等。”戈利斯特警觉起来了，“您没有搞错吧？这确实就是那枚戒指吗？”

“我可以发誓，发什么誓都行！”库拉金娜坚决地说。

“您什么时候看到戒指？”

“这……”她沉思起来，“已经很久了，在去年……杜纳也斯基胡说什么尼娜偷了他的钱，还有手表！”突然，库拉金娜气愤至极，“她不可能，尽管我们在小时候生活极端困苦，但别人的钱，一个戈比也不拿……是的，我们还讨过饭。许多人就是活活地饿死的！内战之后，经济崩溃，到处挨饿。一些孩子在市场上做小买卖，偷东西。可是，我和妹妹从来没干过！因为妈妈就这样教育我们的。她说上帝会惩罚……现在我知道没有上帝。可那时候我们害怕……我从来也不相信尼娜会拿走别人的什么东西。要是真有，就把我的手剁下来！昨天夜里，我一点都没有合眼。总是想啊！想啊！既想到戒指，也想到这些该死的钱、手表和公债券……杜纳也斯基胡说八道，这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心里琢磨着，难道是他自己……”她突然打住话头，仿佛害怕再说出什么。

“请接着说，接着说。”戈利斯特态度温和但却固执地请求。

“是否是他杀了尼娜？会吗？”库拉金娜轻轻地说。

房间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走廊里传来不知什么人的大声谈话声。戈利斯特注意看了看库拉金娜，岔开话头问道：

“他吓唬过她吗？”

“尼娜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有一次她脱口说出，跟杜纳也斯基没法再过日子，该怎么样？说实话，我甚至向她暗示过，如果忍受不了，就走。我说你还年轻，好日子还在后头。尼娜却问上哪去？”

询问库拉金娜之后，戈利斯特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内，久久地踱来踱去，考虑着她所说的情况，这位青年妇女失掉了亲人，因此她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她认为有权要求惩罚凶手。戈利斯特多次见到过类似遭受厄运的人们，他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强烈的复仇感。他们准备把仇恨和怒火投向每一个可疑的人。然而这种怀疑常常是不公正的……

库拉金娜抱怨自己妹夫的情况，戈利斯特在和

她的第一次谈话中就已察觉到了。昨天，在他们坐车由工厂去检察院路上的谈话中，这种不友好的苗头就有所表露，因此，关于库拉金娜对杜纳也斯基所持态度的客观性是无从谈起的。但她所说的那些事实……

就拿戒指来说吧。东西虽说并不贵重，但是作为对母亲、对外祖母、对姐姐的留念……也许，尼娜在匆忙中把它遗漏了？

杜纳也斯基在声明中证实妻子的出走是非常突然的。完全有可能在短暂的几分钟之内收拾东西，把戒指忘在家中了。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起初库拉金娜怀疑妹夫杀死了妹妹，后来才在思想中自个‘想起’了这些揭露杜纳也斯基的事实呢？而在高脚盘里的戒指完全是另一个。”戈利斯特思考着。

库拉金娜根本就没说出尼娜抱怨丈夫的具体事实。是的，有过争吵，甚至还有可能动过手。戈利斯特设想，尼娜可能说过与杜纳也斯基分离的话语。但是，她以往并没有采取过任何具体行动。如果尼娜真是她丈夫犯罪的受害者，那就难以理解，杜纳也斯基为什么要对妻子下毒手，并采取这种残忍的方法？凶杀的动机完全不清。

也许是暂时不清楚。戈利斯特看了一眼写下的备注：“通过国家政治安全总局核实。”并想到，也许她真和某个外国人有联系，而姐姐却毫不怀疑。再说，杜纳也斯基本人也没有说过一句……

说真的，还有一个博林——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人物。正象杜纳也斯基所说的，是他家的朋友。也是医生，还是外科医生。昨天，当谢苗诺夫斯基注意到凶手的职业特点时，戈利斯特也想到了他。

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特尔涅尔在与戈利斯特谈话时曾说过：“杜纳也斯基怀疑妻子和某一个医生乱搞男女关系，可能跟他跑了。”

但是，无论是库拉金娜，还是特尔涅尔，他们的消息都来自杜纳也斯基。

有关工程师赫鲁明的传说也不清楚。度假逾期不归，妻子伤心流泪……

戈利斯特不想把事情挂起来，拖下去，他决定调查杜纳也斯基的两个熟人：博林和赫鲁明。戈利斯特认为与杜纳也斯基打交道要格外谨慎。他是一名老资格的法医，通晓侦察工作。侦察员的任何不慎都会惊动他，而毫无根据的怀疑则会使他遭受委屈，严重影响他在职务上的声誉。

但是戈利斯特并不急于与他见面，而要看看他

在这种情况下中的表现，也许还可以小心地探一下他的口气。这种机会是很方便的。戈利斯特办理的案件中还有一起自杀案。案情相当复杂。考虑到自杀者与其妻兄的关系很坏，（他多次威胁要和姻亲算账）同时还有财产纠纷，（不能把继承下的房产分开）因此，戈利斯特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而且检查尸体法医的结论也引起了侦察员的怀疑。

当得知杜纳也斯基明天要来找检察院的一个同事时，戈利斯特请预先告诉他，杜纳也斯基来的时间，他准备意见法医，并要请教一些问题。

戈利斯特很快就查明，博林是一名儿童外科医生。这引起了侦察员的警惕。谢苗诺夫斯基曾说，杀害尼娜的凶手解剖术高明。

戈利斯特来到博林工作的医院，与主任医生见了面，要求他介绍博林的情况：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恋人，爱好等等。

原来博林在30年的生涯中，已结婚两次，去年春天他与第二个妻子离婚了。

主任医生不愿意谈论下属的私生活。按他的说法，博林是一名优秀的专家，但是戈利斯特轻易地就查明了儿童外科医生喜好追逐女性的弱点，现正和一些年轻的护士们勾勾搭搭。这些情况令人深思：也许，杜纳也斯基对博林的怀疑确实是有根据的。

这一天，戈利斯特没有能调查工程师赫鲁明的情况，被其他急事干扰了。

第二天早晨，戈利斯特得知杜纳也斯基已来到检察院，便请他到自己办公室来。

杜纳也斯基比中等个稍高一点，举止坦率，端正的脸庞多少有点显得一本正经。目光深邃、严肃而坚定，仿佛在考察、研究对方似的。他有点象十月革命前的歌唱家韦尔京斯基——莫斯科和彼得堡观众崇拜的对象。当时戈利斯特是个中学生，曾有幸参加过他的音乐会。杜纳也斯基某方面还有点象扮演卡列宁的演员赫梅廖夫。

问过好以后，戈利斯特客气地请杜纳也斯基在桌旁坐下。

“杜纳也斯基，我这儿发生了一点疑问。”戈利斯特请教说，并把有关自杀案件的法医检验结论请他看。

“依我看，法医结论在技术上完全可靠。”杜纳也斯基说。

所谈的这件自杀是用刮脸刀干的。死者的照片，确切地说，伤口本身的性质引起了戈利斯特的